

艾登回忆录

节译本

(内部读物)

4199

史所

世界知識出版社

艾登回忆录

(节译本)

安东尼·艾登著

北京编译社译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年·北京

THE MEMOIRS OF
SIR ANTHONY EDEN

"The Times"

London, 1960

根据倫敦“泰晤士报”1960年1月11日
至2月1日連載譯出

· 內 部 讀 ·

艾登回忆录

(节譯本)

[英] 安东尼·艾登著

北京編譯社譯

出 版 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印 刷 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 华 书 店

定 价 每 本 一 元 二 角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0 $\frac{1}{8}$ · 插頁 2 · 字数 244,000

1960年8月第1版 ·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535

出版者的話

安东尼·艾登自1935年起曾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与作用。本书是他自1951年再次出任外交大臣，到1957年辞去首相时为止，参加各种国际活动和对重大事件的记述。

作者在书中的回忆，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书中透露，在美英图谋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組織“东南亚防务条约”、“巴格达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等侵略性集团，尤其是在苏伊士运河事件等问题上，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明争暗斗，互挖墙脚，曾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与爭吵。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叫嚷西方应在冷战中保持“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鼓吹执行一项“非洲馬歇尔计划”，把中亚、西亚和非洲都网罗在西方联盟之内，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

本书的内容中有许多是迄今以前尚未公布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与当前帝国主义政治动向有密切关联，值得加以研究或参考。

本书系根据1960年1月11日至2月1日的倫敦“泰晤士报”連載的“艾登回忆录”譯出。該报所发表的是原书的摘录。为了保持原来面貌，中譯本各章节标题均按該报原样譯出。

WLL/PO/12

目 录

前言摘录.....	1
第一章 再度出任外交大臣;最初在印度支那問題 上同杜勒斯先生的爭执.....	2
第二章 美国再次談論干涉.....	22
第三章 莫洛托夫关于德国問題的私人意見.....	38
第四章 拯救垮台的欧洲軍計劃.....	54
第五章 面临中东即将来临的風暴.....	73
第六章 埃及走向革命,英美意見分歧	89
第七章 出任首相	108
第八章 1955 年最高級會議上的德国問題	131
第九章 埃及获得苏联的轰炸机和坦克	143
第十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	163
第十一章 倫敦會議上杜勒斯的强硬口吻	179
第十二章 数星期危机中的关键文件	196
第十三章 杜勒斯先生破坏他自己的提議	216
第十四章 到联合国去的令人厌倦的巡礼	229
第十五章 与法国总理及外长在 10 月 16 日举行会谈.....	243
第十六章 决定干涉	259
第十七章 在西奈的冲突	274
第十八章 为什么英法决定停火	290
第十九章 苏伊士危机的惨痛教訓	306

前言摘录

1957年春动完手术以后，我就想写一本书，谈谈我担任公职的几年中的一些事情。我本来打算按照众所公认的时序来写——就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直写到目前。

这种写法的好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训以及这些教训在五十年代的应用，都能够比较容易地显示出来，而把这些教训应用到五十年代，正是我的回忆录的主题。不过，这种做法却带来一种限制，而我认为这种限制是非常严重的。这样写法，至少要过四年以后，我才能谈到比较近期的事情。我认为我不应该等待这样久。这本书将暴露一些创伤，这样做将有助于我们医治这些创伤。

我负责处理我国外交政策的年代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5年到1945年，其中，从1938年2月直到次年秋初的十八个月，有一段中断，原因是我辞去了张伯伦先生政府中的职位。9月3日大战爆发，我随同丘吉尔先生再度回到内阁，并在1940年底再度出任外交大臣。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1年秋到1957年1月，在这一段时期中，我不是担任外交大臣，就是出任首相。这卷书所要叙述的，就是后一阶段，但是我在这一阶段所主张和奉行的政策，却是以我早期的经验为基础的。在推行这些政策时，我发现我常常在意见上同我国以及盟国的一些人不一致。这一直是我感到遗憾的一个原因。

我这一生的许多时间都用在指导或执行外交政策上，因此我感到，我应该把这些事件按照我的看法写下来。我在这卷书中写下的许多意见和种种决定，都是我在当时作出的。我希望我这段叙述、我的推论以及我的经验，对别人能有所裨益。

第一章

再度出任外交大臣；最初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同杜勒斯先生的爭執

〔在1951年的大選中，保守黨取得了勝利。丘吉爾先生——當時還沒有加爵——出任首相，艾登先生則第三次接掌外交部。當時的國際形勢非常黯淡。在聯合國以及在其他地方，西方同斯大林俄國的關係達到了最惡劣和極端令人疑慮的地步。

中東方面的緊張氣氛日益增加。由於摩薩台博士的國有化政策而造成的伊朗石油危機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在選舉前的兩個星期，埃及總理納哈斯·巴夏片面地廢除了“1936年英—埃條約”和1899年的蘇丹協定。

但是，事實證明，危機一觸即發的地區卻是在遠東。“在我擔任外交大臣的最後四年中，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問題是我不得不对付的最危險和最尖銳的問題。”

1953年末，印度支那的戰爭進入了一個危急階段。越盟^①的部隊受到來自中國邊界的接濟，源源滲入老撾。雖然越盟部隊的前進受到了制止，但是他們又準備圍攻奠邊府的前哨。

① “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系於1941年5月19日成立，是在東洋共產黨（越南勞動黨的前身）領導下，包括越南民主黨以及各種救國團體的，領導越南人民進行解放鬥爭的統一戰綫組織。這裡以此指稱現在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譯者

据点，这个据点是法国人在 11 月占领的，随后就作为一个前进基地而大大加强了防御工事。

1954 年 1—2 月間，四大国在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有艾登先生、杜勒斯先生、皮杜尔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这次会议为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会上一致同意再召开一次会议，考虑朝鲜以及东南亚事务，与会者规定为共产党中国、俄国以及西方的三个国家。这次会议定于 4 月 26 日在日内瓦举行。——“泰晤士报”编者]

日益严重的危机

当我们在柏林进行谈判的时候，东京三角洲正在进行英勇而残酷的战斗。战士们显示了非凡的勇敢精神，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的士气始终高过巴黎市民的情绪。

为了不致削弱日内瓦会议上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法国必须在军事上坚守他们的阵地，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法国扩大他们的战斗规模或者鼓励法国消耗它的有限的资源，硬要在军事上打出个胜负来，这样并不符合法国的最高利益。美国人却有不同的看法。2 月 8 日，美方在国务院对我们的大使[罗杰·麦金爵士。——“泰晤士报”编者]说，法国的目的不在于赢得战争，而在于取得谈判的地位，这一事实使美国政府感到不安。

这时候，美国副国务卿比德耳·史密斯先生正同总统邀请来考虑印度支那问题的一小组人，重新对局势进行估计。史密斯先生对我们的大使说，美国无意派军队前往印度支那；纵使总统有派遣军队前往的权力，他也不愿这样做。但是美国驻西贡大使却直截了当地说“除非中国提出绝对的保证，我们决不让法国人溜走”。我不懂得，这个双重目标如何才能实现。

严重的危险

3月29日，杜勒斯先生向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他认为把共产主义制度强加在东南亚头上的做法“不应该消极地加以接受，而应该以联合行动进行抵抗。这种做法也许会招致严重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那么我们今后几年内所面临的危险，将要比目前这些危险更加大得多。”美国发表强硬的言论，我并不反对，但是我要弄清楚他们是不是说话算话。有人告诉我们，美国并不准备以唯一有效的途径——从陆地上——干涉印度支那的战争。重要的是，不要提供不会有成效的次要的援助去鼓励法国。我们有必要明确我们自己的立场。于是我在4月1日致电我国驻华盛顿大使：

“你最近的报告说明，美国政府一方面反对以美国部队作为击败越盟的手段（在我们看来，这种反对是正确的），但又希望，在美国施加足够的压力、供应物质援助以及提供可能的政治和技术顾问的条件下，法—越军队仍能获得胜利。可是，女王陛下政府驻巴黎大使已经表明，法国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这种政策了。

“我们完全赞同美国的愿望，那就是不让印度支那被共产主义所侵占，同时我们也同意，只要有成功的希望，就应力劝法国保持目前所作的努力。但是在认真研究了种种军事的和政治的因素以后，我们认为，不去正视下面这一可能性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有利地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条件也许会不再存在。如果现在不考虑这种可能性，那么将来在日内瓦的会议上，要是我们一旦被接受同印度支那共产党人妥协的政策，就很可能增加达成三边协议的困难。”

分治的办法遭到拒絕

罗杰·麦金斯爵士向杜勒斯先生和比德耳·史密斯先生轉達了这些意見。麦金斯爵士还补充說，如果举行談判，我們认为分治是損失最少的解决办法。对于这一点，史密斯先生回答說，美国已經仔細研究了分治的解决办法，但是断定这种做法只是一时应急之計，日后会导致共产党对东南亚的統治。因此，他們拒絕了这项計劃。接着，杜勒斯先生對我們的大使說，最好是用軍事行动相威胁的办法，强迫中国停止对越盟的援助。杜勒斯先生說，我們目前在那个地区拥有軍事优势，而在几年之內我們也許就会丧失这种优势。因此，如果对方对这一警告置之不理的話，我們現在就應該有能力把我們的威胁付諸实施。軍事行动固然会招致危險，但是如果对印度支那放手不管，那就危險更大。美国正在考虑，由几个国家提出一項对中国海岸将采取海空軍行动的联合警告，但是并不提出派遣美軍登陆的威胁。

4月6日，美国駐倫敦大使阿尔德里奇先生來訪，和我討論当前的局势。同他长談过以后，我对美国的某些忧虑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交給我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除了提到一些別的事項以外，还表明美国正担心中国人会参与决定哪些国家应参加日内瓦會議有关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根据美国輿論的情况看来，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美国的新建議

就在这个时候，奠边府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于是美国政府向法国和我們提出一項新建議。这个建議的大意是，有关各国应在日内瓦會議召开之前发表一个庄严的宣言，表示准备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五十一条^①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中国继续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美国政府告诉我们，在提出这个警告的同时，还要进行对中国海岸采取海空军行动、对印度支那本身积极干涉的威胁。这个特别联盟包括美国、法国、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支那联邦的三个成员国；这个联盟将同时对着手筹组东南亚的集体防御。

来自巴黎的报告表明，这种想法在那里受到了冷遇。4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致电丘吉尔爵士，劝他同意美国的计划，同时提出建议说，杜勒斯先生可以在几天内飞抵伦敦，以便讨论他的建议。我们接受了这个提議，但是我立即警告驻华盛顿的罗杰·麦金斯基爵士，不要在这个阶段发表任何言论，以免使我们对建议中的联合行动承担义务。

无补于实际

我们这时正面临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我下定决心，不让我们在匆忙中做出不明智的军事决定。对于在东南亚成立集体防御组织这一点，我欢迎美国的建议，因为这将有助于维护马来亚和香港的安全，同时也会消除我们被排斥在美澳新条约组织之外的不正常现象；这个条约的缔约国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项安全条约是在1951年由三国政府签订的。——“泰晤士报”编者〕

但是，我认为，在我们去日内瓦举行会议之前就成立和宣布防

① 按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译者

御聯盟；這在軍事方面對我們很可能無補於實際，而在政治方面又會給我們帶來損失，因為這會把我們可能結交的重要盟國給吓跑了。5月初印度支那將進入雨季；有好幾個月之久，雙方都將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戰鬥。既然在這段期間以前，法國的軍事力量不致於全部崩潰，因而我認為，對目前軍事局勢的憂慮，不應成為我們政策中的指導因素。

在杜勒斯先生訪英前不久，我曾為我的同僚寫了一篇有關目前形勢的概述，我的看法如下：

“美國的建議認為，對中國進行威脅，說我們將採取報復行動，會使它停止支援越盟。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根本的缺點。向中國提出警告說：進一步的具體行動必然引起報復（這可能是一種有效的威懾），這是一回事；而要求它停止採取已經採取的行動，又是另一回事。我看不出究竟有什麼樣的威脅足以使中國忍受這樣屈辱的挫折，甘心放棄越盟而不要求任何保全顏面的讓步作為代價。如果我這個看法是正確的，那麼對中國提出的聯合警告就不會收效，那時那個防禦聯盟勢必只好不光彩地縮手，否則，就只好對中國採取戰爭的行動了。

“美國政府現在似乎想採取封鎖中國或轰炸中國的內外交通綫的做法，我們的三軍參謀長在聯系到朝鮮來討論這些做法時，認為這些都不會收到軍事效果。然而，這種行動只會給中國種種借口，來引用中蘇條約，因而很可能導致世界大戰。我們也不應讓英國部隊參加印度支那的戰鬥。考慮對中國提出警告也許以後還會有機會。比方說，如果日內瓦會議能夠通過談判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可能以分治為基礎），然後再對中國提出警告說，如果共產黨對印度支那作進一步的入侵將招致報復，甚至可能引起戰爭，那麼，這種警告將更能制止中國，同時也更能為英國（和法國）的輿論所接受。美國人提出，如果威脅未能產生所希望後果，那麼就採取

軍事行动来对付中国,但是对于他們自己所提議的軍事行动,看来他們並沒有任何明确的概念。他們也沒有估計这种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在另一方面,組織东南亚集体安全的建議本身,倒是很吸引人的;在美国人自己的想法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向他們表达我們的看法是有好处的。”

印度的关注

我的同僚完全同意这些意見。美国政策在印度輿論中所产生的影响,使我們更加怀疑美国政策目前的趋向是否明智。在衡量我們在日内瓦會議上的成功机会时,我深深地感觉到,會議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度以及其他对解决印度支那問題表示关心的东方国家的态度。我知道,中国在目前决不願同印度鬧对立;而且必然会力图迁就亚洲的一般輿論。印度对日内瓦會議的結果始終表示关怀,它可以在幕后起相当大的作用。

誰也不知道前途如何,但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世界上某一个与印度有密切关系的部分采取行动时,不应把印度給疏远了。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当我听到我們駐德里的高級專員說,杜勒斯先生最近发表的一些演說在那里产生了最恶劣的印象时,我便感到不安了。

4月11日,杜勒斯先生抵达倫敦,我們当晚作了一次非正式的交談;以后两天又进行了正式會談。我发现美国政府已經修改了他們將公开提出警告,說要使用武力的这种計劃,这使我感到很放心。他們在会外把这个警告的草案拿給我們看,但是在正式的討論中並沒有提出。

严重的后果

11日晚在美国大使館进过晚餐后,我們举行了第一次會談。外

交部助理次官丹尼斯·艾倫先生与我同座。杜勒斯先生应我之請，向我們詳盡地解釋了美国政府对印度支那問題的建議的背景。杜勒斯先生說，美国政府已經得出結論，不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法国人已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付当前的局势。如果法国在印度支那站不住脚，其后果是极端严重的。不仅是泰国，就連馬來亞、緬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最后都会被共产主义所併吞。奠边府的战役已經到了极其严重的阶段，美国軍事当局认为法国获胜的可能性不大。杜勒斯先生接着說，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參謀长联席会议在三周前建議，美国應該以海空軍部队干涉印度支那的战争。他告訴我們，美国的一些航空母艦已經从馬尼拉向印度支那海岸移动了。

杜勒斯先生經過考虑后，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不应单独行动，而且在决定干涉以前，必須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須得到某种保証，表明法国政府願意让印度支那联邦成員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撾。——“泰晤士报”編者〕在法兰西联邦的範圍內获得真正的独立，从而为有效的抵抗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第二，美国政府必須明确，它的盟国，特别是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当前的局势是否也采取同样严重的看法。尽管杜勒斯先生已不再考虑特別針對中国提出的警告，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他希望看到建立一个可能发展为东南亚防御組織的特別联盟。他认为，这个組織本身就会制止中国对印度支那作进一步的干涉，同时也会加强我們在日内瓦會議上的地位，因为这个組織証明我們是團結一致的。

关于万一法国在印度支那垮台后我們是否有能力保卫馬來亞这一点，我們已經注意到美国人是抱有悲觀的看法的，因此，我首先在这个問題上提出一些看法。我說，女王陛下政府决心繼續保持我們在馬來亞的地位。虽然印度支那局势的恶化必然会大大增加我們任务的困难，但是我們决心尽最大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我又

說馬來亞的安全地位正日益改進。

隨後我把杜勒斯先生的建議的兩個方面區分開來：在東南亞建立集體安全體系是個長期問題，而在印度支那採取“聯合行動”則是較為迫切的問題。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對杜勒斯先生說，我們歡迎在東南亞組織集體防禦的意見，但是這個問題需要極其慎重的考慮和研究，在成員的問題上尤其是這樣。我着重指出，無論如何不應該有意識地把印度以及英聯邦的其他亞洲國家排斥在組織之外。

另一個問題是印度支那本身的問題，那裡的戰鬥還在進行，同時我們已經答應同蘇聯和中國的政府就印度支那問題在日內瓦進行商討。如果談到要採取聯合干涉行動的話（不管這種干涉是軍事方面的或其他方面的），或者要在日內瓦會議以前提出警告的話，那都需要進行極其慎重的考慮。單純通過軍事手段能否解決印度支那的局勢，是令人懷疑的；而且我們至少也應該看一看，共產黨人究竟會在日內瓦會議上提出些什麼建議。因此，我對杜勒斯先生說，他訪問倫敦和巴黎以後所要發表的公報最多只能是一個警告，即：我們不允許共產黨的軍事行動左右日內瓦會議的工作。我並不相信，我們應該立刻提出有關東南亞集體安全的任何決定，縱使這種決定已獲得一致的同意。

我們又進一步討論了一些問題，接着杜勒斯先生對法國作出了悲觀的結論。他懷疑法國是否由於歷史的演變，正在不可避免地衰退着，而不再是一個大國了。我避免就這些看法做出直接的評論，只是委婉地說，根據在馬來亞的經驗，我們能夠了解法國在印度支那所碰到的困難，在那裡縱使軍事局勢發展很順利，法國人也必然要面臨長期的游擊戰問題，其情況甚至會比馬來亞局勢最糟時還要嚴重。

不受牽連

我們在4月12日和13日舉行的正式會談的效果并不大于初次會談。我說，我只能同意參加初步討論組織共同安全體系的可能性。關於干涉問題，杜勒斯先生深信，印度支那正是採取這種行動的地方，只要這種行動有必要，只要具備兩個條件就行。這兩個條件是：第一，法國政府明確宣布給與印度支那聯邦成員國以獨立；第二，使這場戰爭國際化。杜勒斯先生說，這兩個條件再加上外來的空軍和海軍支援，就提供了獲勝的可能性。杜勒斯先生又說，他深信國會會授權總統使用美國的海空軍部隊，甚至還可能使用陸軍部隊。

杜勒斯先生當時斷言，印度支那的局勢同1931年日本侵略滿洲的情況以及希特勒重新占領萊茵地區的情況相似；但是他這種說法並沒有使我信服。我解釋說，英國的三軍參謀長並不認為，盟國的干涉可以僅限於空軍和海軍。我對杜勒斯先生說，由於日內瓦會議在望，英國的輿論必然會堅決反對在目前承擔投入印度支那戰爭的義務。

同時，建議中的東南亞安全體系成員問題面臨着重重困難這一點也變得明顯起來了。我一再強調指出，雖然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很可能寧願置身於這種安排之外，但是我們仍然應給予一切參加的機會，同時應使它們完全了解情況。如果它們不能同我們在一起，我們絕不能使它們和我們對立。

不能相比

另一方面，杜勒斯先生希望，任何可能邀請印度參加的跡象均應避免。他解釋說，如果談到要把安全條約向西擴展，而包括印度的話，那麼美國同樣就會提出“強烈的要求”，要把安全條約向東伸

延，而把国民党中国和日本也包括进去。因此他建議說，以印度为一方而以福摩薩为另一方的这种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都应该加以避免，而在刚开始时，討論的范围應該先限制在东南亚本部。我不喜欢这种把印度和福摩薩等量齐觀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两者是不能相比的。

不过，在这个問題上，我們並沒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們在会谈后所发表的联合公告仅仅声明：“……我們准备和其他各主要有关国家一道研究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內建立集体防御的可能性，以便保証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自由。”

我們的这次会谈記錄，包括下列这一段同随后发生的事件有关的文字：

“大家取得一致意見，艾登先生在对下院发表任何声明时，应說明，关于成員国的全部問題，留待进一步考虑，这一問題要像和巴基斯坦政府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商討一样和印度政府进行商談。”

結果，下院並沒有提出有关拟議中的安全条約的組成問題，但是如果下院提出这个附带的問題，我就会根据双方同意的說法来回答。

提前采取步驟

然而，倫敦会谈结束后不到三天，可以看出，杜勒斯先生早就按照自己的主見，采取了一些步驟，以解决成員国的問題。4月16日，罗杰·麦金斯爵士报告說，杜勒斯先生将于20日在華盛頓召集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菲律宾、泰国以及印度支那联邦三成員国的大使举行會議。會議的目的是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工作組以便研究东南亚的集体防御問題。美国国务院也再次提出警告，对于任何要把印度包括在內的企图，美国都要回敬，而把福摩薩包括在內。